

日本“中国归国者”记忆共同体的生成机制与代际演变

山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

任惠中

[摘要] 文化记忆理论为欧洲战后记忆实践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但在亚洲语境下,日本战后历史认知与记忆建构长期存在结构性张力。中日战后记忆的复杂特质,致使文化记忆理论在亚洲语境本土化应用面临适配性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化拓展,为重新审视与阐释亚洲语境中的中日文化记忆提供了新的价值取向与理论支撑,亦为文化记忆理论范式的拓展深化提供了新思路。日本“中国归国者”群体,则为亚洲语境下的文化记忆研究提供了“记忆共同体”的典型实证案例。依托文化记忆理论框架,从记忆传播场域、代际传承机制与记忆转化路径三个核心维度,可深刻揭示出以中国归国者为载体的中日文化记忆在跨文化互动中的生成逻辑与建构路径。这一研究视角兼具现实价值与学理意义:在现实层面有助于消解战争创伤、促成区域历史共识与跨文化对话;在学理层面则通过对中日案例的挖掘,有效补益了文化记忆理论的亚洲本土化范式,为跨文化记忆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阐释视角。

[关键词] 记忆共同体 文化记忆 中国归国者 代际传承 战后记忆

引言

近年来日本政治生态右倾化显著影响其历史认知及外交走向。右翼话语在战争记忆塑造中主导性的不断强化,致使其官方叙事在历史责任表述上转向模糊化与修饰化,甚至出现否定倾向。相较于德国战后通过立法规范、纪念设施建设与反思性历史教育构建起的记忆文化,日本错误的历史叙事已渗透至教育、媒体与公共讨论之中,造成民众对侵略历史的理解片面与偏颇。然而,单纯停留在对日本官方历史修正主义的政治批判,往往难以触及社会深层的记忆肌理。如何突破国家主义叙事的单一框架,寻找能够连接中日历史经验的“具身性”记忆载体,成为打破当前历史认知僵局的关键。在此背景下,中国归国者作为横跨中日的战争亲历者与跨文化迁徙者,为审视战争责任与历史认知的复杂交互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对象。

所谓“中国归国者”,是指1945年滞留中国、后陆续返回的日本遗孤、妇女及其家属(兰信三,2000)。这一群体的形成与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殖民扩张政策直接相关。日俄战争后,日本曾推行“满洲开拓团”等移民计划,大批日本平民被送往中国东北等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殖民机构瓦解、交通阻断,大量开拓团成员、军政人员家属因溃散、失联而滞留中国,其中遗孤多为婴幼儿,被中国家庭收养长大,妇女则多通过婚姻、寄养等方式融入中国社会。据日本政府统计及学界考证,截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累计返日的中国归国者及随行亲属超10万人。作为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重要载体,该群体既是日本殖民政策的间接受害

[收稿日期]2025-11-28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4年度山西省革命文物研究专项课题“日本关于山西抗日战争文献史料梳理及山西战争记忆研究”(项目批准号: SXGMWW2024005)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信息]任惠中,男,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日本政治与外交、区域国别研究,电子邮箱: renhuizhongmichael@163.com

者,其命运轨迹也折射出中日两国近现代史的交织与战后关系的修复进程,因而在中日关系史中占据特殊位置,是解读两国战争记忆、伦理反思与民间互动的关键样本。

关于“中国归国者”的研究,中日学界已形成较为深厚的学术积淀。既有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维度,其一,聚焦历史溯源与政策梳理,注重还原日本遗孤的形成背景与归国进程,厘清中日两国相关政策对遗孤群体的影响(兰信三,2000;关亚新、张志坤,2005;杜颖,2012等)。其二,侧重个体经验、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入研究,多采用口述史与生活史调查方法,挖掘战后遗孤及后代在中日文化夹缝中的身份困惑、社会适应困境、文化调适策略等问题(高桥朋子,2009;张龙龙,2021等)。其三,关注记忆构建与伦理叙事研究,着重探讨日本遗孤群体的记忆传承以及该群体的记忆叙事中交织的家国伦理、人道道义与历史正义等核心议题(南诚,2016;赵彦民,2017等)。

既有研究虽从历史、社会、记忆等维度勾勒出中国归国者群体的生存图景与记忆特征,却尚未充分阐释该群体多元记忆何以超越个体与家族边界,凝聚为具有跨代际、跨国性的集体记忆形态,更缺乏对这种记忆凝聚背后“共同体”生成机理的系统性剖析。事实上,归国者群体兼具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特质,其记忆实践长期置于中日民族国家的双重语境、个体创伤与公共叙事的张力之间,这种独特性使其记忆形态天然具备构建共同体的基础。

1 中国归国者“记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中国归国者的记忆生成融合了个体经验的战争创伤、家族叙事中的流徙苦难以及中日双重语境下的民族与国家记忆。归国者既身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体系之中,又在战后成为被国家抛弃的受害者,其复杂身份揭示了战争对个体命运与集体认同所造成的深刻撕裂与重构。由此形成的记忆共同体,不仅贯通个体、家族与国家三个层级,也集中呈现了私人创伤与公共叙事之间的持续张力,展现该记忆共同体多元互动中的独特生成逻辑与历史意涵。

1.1 “记忆共同体”中“加害者”身份

中国归国者叙事长期被定位于被动且悲剧性的“战争受害者”。然而,若回归“满蒙开拓团”的殖民场域,其身份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在此,必须深刻辨析“个体道德选择”与“结构性加害”之间的本质差异,这构成了该群体记忆生成的深层逻辑。首先,就个体道德选择而言,归国者作为当时的移民群体,其行为动机多源于生存本能或对国家动员的盲从,而非基于主观恶意的暴行决策。这种“非主动性”使个体在心理上获得了某种道德豁免权。

其次,就结构性加害而言,该群体的加害性并非体现为个体的极端残忍,而是体现为一种“体制内的系统性共谋”。日本开拓团民的日常生计建立在土地兼并与劳动力剥夺的基础上,他们成为殖民侵略、资源掠夺的间接受益者。1937年,日本实施《满洲农业移民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大规模将贫困农户、青少年和妇女迁至中国东北,驱逐中国农民并建立日式殖民村落(小都晶子,2006:2)。此外,开拓团通过“劳役”与“征发”体制,使成员在土地兼并与劳动力剥夺中成为间接获益者(细谷亨,2018:30-39)。军事动员方面,1938年起实施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制度,使得大量青少年既是农业劳动力,又是军国主义的灌输对象,成为战争机器的重要补充力量(樱本富雄,1987)。在文化层面,开拓团民通过“民族协和”方针协同实施文化同化与行为规训,成为文化侵略的间接代理人,助推东北社会的文化瓦解(浅田乔二,1976:3-107)。作为日本帝国殖民链条的执行末端,他们被嵌入到掠夺土地与压制中国民众生存空间的结构之中。在这种结构下,个体的“日常生活”本身即构成了对殖民暴力的维持。这种加害是结构性的,本质是个体意志被国家

机器收编后所表现出的缺乏独立道德思考与判断的顺从性恶行。

这种区分直接决定了其记忆的差异化生成,正是由于缺乏“个体道德选择”的主观故意,归国者在记忆重构中倾向于将殖民行为视为“听命于国家”的必然。这种机制导致了对“加害逻辑”的选择性遮蔽,即大多数战后遗孤所认为的“我没有选择,所以我没有责任”。相反,1945年被国家抛弃后的惨烈创伤,因其具有强烈的具身痛感与明确的被剥夺感。这种“结构性加害”与“具身性受害”的错位,最终导向了该群体在记忆实践中对受害身份的高度认同与对加害责任的集体失语。归国者的记忆共同体生成逻辑呈现出多元属性,既包括个体与家族层面的创伤记忆,也折射出国家与民族认同的构建过程,展现出在历史与情感张力中交织与演化的复杂性。

1.2 “记忆共同体”中“受害者”属性

从战后国家政策视角来看,日本政府在战败后迅速启动对滞留海外国民的“切割”策略。1945年战败后,日本政府以“内地的粮食短缺以及思想、经济局势复杂”为由,对滞留在外的日本人采取消极应付态度。其后盟军总部优先安排军人及军属的复员,而未对民间人士(日本难民)的遣返工作采取实质性措施,致使超过32万移民在逃亡过程中经历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南诚,2009:124)。

1959年颁布的《未归还者特别措施法》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法理操作工具。该法通过行政命令,宣告约13,600名未确认死亡的滞华日本人为“战时死亡”,并强制注销其户籍(厚生劳动省,2025)。这种“法律性死亡”,不仅是一种去户籍化的手段,更是国家战争责任的制度性逃避,是对历史罪责的行政切断。与此同时,日本厚生省对“孤儿”身份的界定进一步加深了制度排斥。将“遗孤”限定为13岁以下儿童,并附带极为苛刻的认定条件(日本厚生劳动省援护局,1987:17)。这类标准将大量因战乱流离的残留儿童、妇女从“战争受害者”身份中剥离,转化为“自愿滞留者”,由此回避对造成归国者战后悲惨命运的国家责任。战后同为战败国的西德,通过《联邦被驱逐者法》等措施确立了国家对滞留海外国民的主动接纳责任,不仅赋予其自动公民权,还提供了系统的社会整合援助。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则将国民视为战争遗留的“多余负担”(Lori Watt, 2009)。这种制度性遗弃违背了国家的基本法理,即国家作为战争的发起者,有义务对因其军事扩张而陷入困境的国民承担应尽的战争责任。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虽承认归国者身份与回国权利,但其后数十年中,日本政府对归国者的援助始终采取将其等同于“普通贫困者”的处理方式。中国归国者被纳入《生活保护法》框架下接受最低保障补助,而非获得战争受害补偿(穴戸伴久,2008:12-114)。这一援助制度的核心特征是“非特殊化”与“去历史化”,否认归国者因战争与殖民侵略所造成的结构性受害,在社会舆论中建构出一种“领福利不工作”的污名象征。即便在1994年后,日本政府设立面向归国遗孤的“特别支援项目”,其政策定位仍是“生活支援”而非“战争责任补偿”(张龙龙,2017:69-80)。这反映出日本国家在战争后果处理上的一贯逻辑:以最低经济代价维持表层人道主义,同时制度性回避殖民责任、军事责任与移民政策所产生的历史后果。2008年之后,随着中国归国者申诉审判,日本政府才妥协性地陆续出台针对中国归国者的援助补偿措施,但认定条件依然苛刻,补偿力度仍然不大(丁文磊等,2022:487-498)。这些政策结构在社会层面催生出针对中国归国者的显著排斥现象,并使他们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化的身份悬置状态。

1.3 中国归国者记忆共同体生成逻辑阐释

随着世代更替,归国者群体的身份流动性表现出复杂的代际演变特征。第一代归国者作为战争、流离与“弃民”经历的亲历者,其记忆植根于直接的生命体验;第二代子女在语言文化转换与身份认同变迁中发挥承上启下的传承作用;第三代孙辈对中国的认知逐渐脱离直接经验,更多转向家族叙事与象征性认同;第

四代完全在日本社会环境中成长,与战争经验及中国地域已无直接关联,其记忆建构主要以家族叙述与制度性话语的形式被再生产。扬·阿斯曼(2011)所界定的“文化记忆”,强调记忆通过制度、媒介与象征形式被社会化地组织并持续再生产。归国者群体的代际演进,正体现了从“经验记忆”向“文化记忆”转化的记忆共同体生成过程。本文在此基础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坐标,将文化记忆与共同体理论整合,并进行本土化阐释,从生成、实践与转化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第一,本文对中国归国者“记忆共同体”的界定,在逻辑起点上借鉴了斐迪南·滕尼斯关于共同体基于血缘与地缘的情感纽带论述,并超越其传统物理空间聚合的实体界定(斐迪南·滕尼斯,1999)。中国归国者“记忆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如上文所述是植根于特定历史经验,通过记忆叙事与象征再现形成的跨国认同。它并非单纯依托物理聚合,而是以文化血脉传承为根基,以归国者群体的共有生命经验为认同纽带。在代际传承的动态演进中,传统的地缘、血缘情感联结极整合,转化为跨文化语境下具有韧性的集体记忆。

第二,关于共同体建构与转化逻辑的阐释。首先,在建构逻辑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1)指出民族国家本质上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其认同并非天然存在,而是通过语言、叙事、仪式等符号实践建构而成,这种建构方式为解读跨域群体的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视角。本文进一步拓展这一逻辑,归国者的认同并非被动依附于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而是通过对战争、流亡与回归等共有经验的持续“讲述”与“再现”,在微观社群层面编织出一种具有流动性的、跨越中日国境的记忆身份。其次,在微观记忆实践转化上,引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将这一共同体视为由“人类行动者”(中国归国者)与“非人行动者”(政策法规、纪念场馆、舆论报道等要素)共同编织的动态网络系统。在这一网络中,记忆的代际延续不再单纯依赖口述传承,更取决于非人行动者的介入与传播,由此可有效解释集体记忆何以能在代际断裂的不稳定性中保持顽强的存续韧性与传播力。

第三,在记忆传播的私人与公共场域分析上,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理论提供了分析角度,他将承载集体记忆的载体划分为物质化、制度化与象征化三种形态(皮埃尔·诺拉,1989)。本文将中国归国者的记忆实践具体化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级,其一是物质载体,聚焦归国者携带的具有符号价值的“生活原物”以及归国后的生存空间,这些是记忆附着的物质基础。二是制度载体,包含司法行政领域内中国归国者的身份认定、历史赔偿、社会接纳与融入等相关制度的演进过程。三是象征载体,聚焦围绕归国者群体展开的各类仪式、纪念活动,以及中国归国者相关的学术、文学、影视作品等内容。这些载体是归国者群体通过实践活动进行再生产、重构与传播记忆的互动性场域。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区域性记忆共同体的建构方向。王向远(2023)提出,构建“东亚共同体”认同的关键在于摒弃西方式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主张在“作为方法的东亚”中实现“认同”与“辨异”的辩证统一^[16]。中国归国者的记忆构建,恰恰构成了东亚区域内“跨界认同”复杂实践。这一群体的记忆并非孤立于中国或日本,而是在两者的碰撞、重叠与缝隙中生成的。中国归国者记忆共同体不仅以微观经验深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命伦理,更通过这种“记忆载体—记忆之场—记忆转化”的联动,为构建面向未来的、多元共生的东亚记忆共同体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具身样本,并通过中国归国者这一视角,重构一种具有包容性的东亚历史认知。

2 记忆的传播场域

对于中国归国者而言,家庭空间为其最为稳定的记忆场域,战争与流亡等历史经验通过日常互动在私密空间中得以持续重演(Ann-Marie Foster, 2024: 19)。山田朗(2020)进一步指出,战争记忆中的私人领域记忆更侧重于承载暴力、犯罪等受害经验的记忆形式。然而,这些记忆并非完全封闭于家庭内部,而是借助制

度介入与象征实践,与公共领域持续发生连接,使家庭成为私人记忆向社会与跨国记忆转化的关键节点。

2.1 家庭记忆场域的“小叙事”

基于前期对广岛县12户中国归国者家庭的半结构化访谈调查(任惠中,2023:65-67),本文进一步从文化记忆视角考察归国者家庭场域中的记忆特质。家庭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居所,同时是记忆生成与传播的核心场域。家庭凭借其私密性与排他性,在宏大叙事框架下构筑起一道“防御性屏障”,使被宏大话语排斥的个体“负面记忆”得以存续,从而维系历史叙事的完整性。

首先,归国者家庭场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中日语言混杂使用重构了历史文化叙事方式。这一语言混用现象不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障碍,而是一种深层的文化记忆补偿。受访者归国二代指出:“在家中与父母交流时基本是中文交流,和子女、孙辈虽然日语足以沟通,但在讲述中国习俗与文化时更习惯夹杂中文词汇。”这些语言习惯不仅是因为语言转换的障碍,更是为了精准捕捉和传递那些“日语无法抵达”的中国文化情感。这种语言惯习不仅增强了祖辈中国文化经验的传递,也促成了跨代对话中的文化持续互渗。

其次,家庭空间内部的物质文化实践为记忆延续提供锚点。受访家庭普遍珍藏往来书信、老照片及带有中国文化印记的生活物品。一位曾在黑龙江生活四十余年的归国者在展示与中国养父母的旧照片时表示:“自从养父母去世后,就再也没有回中国,这些照片是为数不多的宝贵记忆,也是向子女与孙辈讲述家族历史、传承经验的重要物品。”这些象征物在家庭场域中承载着家族历史经验及情感联结,并在日常生活中持续提示过去的历史,防止个体经验在社会迁徙中消解风化。

家庭场域中,由语言惯习与物质象征共同驱动的内倾式记忆传播机制,既在私人场域中开辟出与宏大公共叙事形成张力的“小叙事”空间,与主流历史话语形成鲜明区隔;又以饱含生命质感的个体经验叙事,有效抵御了主流历史话语对边缘性情感体验的结构性遮蔽。

家庭场域中由语言惯习与物质象征共同驱动的传播机制,不仅在私人领域内开辟出一方与宏大叙事相对的“小叙事”空间,更通过富有生命质感的经验叙述,有效抵御了主流话语对边缘情感的结构性遮蔽,凝聚起情感根基与微观实践基础。家庭场域是承载并持续再生产边缘经验的关键空间,为归国者群体的身份认同提供了情感根基与实践场域。

2.2 公共场域的政策制度性

中国归国者的记忆并非静态地停留在私人领域,而是在社会参与以及制度互动中逐步从私人叙事向公共场域的社会记忆转化,最终构建出兼具私人性与公共性、情感维度与制度支撑的文化记忆场域。公共场域的记忆机制体现在政策制度对归国者身份的法律界定与社会认同的嵌入上。

其一,行政空间中对于归国者的界定与保障缺位。在对待中国残留孤儿问题的政策回应中,日本政府长期采取以“非国家责任”为核心的回避性立场。将残留孤儿视为“战争混乱中的一般受害者”,强调其遭遇属于“战后全国民众普遍应承受的战争损害”(浅野慎一,2021)。在公共制度体系中长期将归国者简单纳入《生活保护法》所涵盖的“经济贫困群体”,导致日本社会形成“归国者仅为经济移民”的认知偏差,由此催生社会对于归国者的排斥与歧视现象(河本尚枝,2021:97-102)。

其二,司法空间的法理辨析与制度形塑。针对上述排斥性制度导致的生存困境,中国归国者在2002年发起国家赔偿诉讼,要求政府承认战争责任并完善援助政策,虽然这些诉讼大多以败诉告终,但诉讼过程中曝光的归国者生存困境在媒体与社会舆论的扩散下,使归国者问题被纳入公共议题范畴进入公共制度场域。

其三,立法空间的法律制定与实施。2006年《促进中国归国者顺利归国及永住归国后自立支援法》的修订,可视为在公共立法空间对归国者身份的妥协性修正。实现了从“贫困救助”向“责任补偿”的范式转换,

首次在法律层面承认归国者的战争受害者身份,并通过支付全额年金、退还健康保险金及补偿生活支援金等制度安排在公共场域为归国者记忆共同体的延续提供了法理支撑与社会认同基础。

公共场域中的归国者问题本质上是记忆与身份通过制度框架被界定、固化与承认的逻辑演进。这一过程不仅折射出政策法律与社会认同之间的互动机制,也从公共空间上确立了中国归国者在战后日本社会记忆中的制度位置与社会能见度。

综上所述,中国归国者的记忆生成既依赖于私密场域的内部维系,又受到公共空间制度性力量的制约与界定。在微观层面,家庭通过日常生活的符号化表达与相对稳定的传播机制,保存了被官方叙事所边缘化的个体经验。在宏观层面,公共制度空间则通过行政认定、司法见证及立法保障,确立了归国者的合法身份与历史地位。这种“私人记忆场域”的稳定性与“公共制度场域”的介入性共同为跨文化记忆共同体的稳固与延续提供了场域基础。

3 记忆的代际传承

中国归国者的代际记忆传承深度嵌入家庭伦理结构、社群互动网络与文化符号的体系之中,形成兼具内聚性与延展性的记忆共同体。在这一多层次互动中,该群体的代际传承不仅延续历史文化脉络,更推动身份认同的动态重构。基于文化记忆理论,可揭示此动态过程如何通过跨代互动逐步建构记忆共同体,并阐释个体记忆叙事在社会嵌入与集体认同形成中的路径机制。

3.1 代际传承的媒介方式

家族史传承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与过去互动的有力方式,家庭伦理空间的建构是承载与传递家族记忆的物化载体。首先,在文化记忆的理论框架中,阿斯曼区分的“沟通性记忆”与“文化记忆”模型为理解中国归国者的代际传承提供了重要分析工具。“沟通性记忆”依托日常交流与直接见证,强调口述、叙事与情感互动的当下性;而“文化记忆”则通过仪式化的物质符号与象征性实践实现长期存续与社会共享。在归国者群体中,中国传统节日仍被保留,成为讲述祖辈经历与传承家族文化的重要契机。这种“仪式中的再现性”在记忆社会学中被视为文化认同构建的关键环节(Lucy Noakes, 2022: 56-81)。其家庭聚餐、节庆装饰与传统食物不仅承载情感依附,更在代际互动中实现了“沟通性记忆”的日常化传递,同时通过这些可重复、可象征的文化符码,将个体经验上升为具有集体意义的“文化记忆”。由此,家庭生活的具体实践成为两种记忆形态交织的重要媒介,使归国者的历史体验得以延续与再生产。

其次,家庭空间中的物质性符号——如祖先牌位、家庭照片、旧书信、从中国带来的器物等,正如阿斯曼对记忆、身份和文化相关论述所揭示的,作为“记忆之物”,物质文化凭借其“时间附着性”,不仅成为历史意识的实在体现,更承担着具体特定身份认同的承载功能。这些物品常在代际之间传递,其象征意义远超物品本身,成为情感与文化的双重凝结物。

最后,家庭叙述与口述传统等沟通性记忆构成了个体经验通向群体记忆的桥梁。记忆文化中沟通性记忆指通过日常交往形成的活跃记忆形式,有助于“内化的历史感”形成(Bart Ziino, 2010: 125-146)。在家庭聚会或日常交流中,长辈以叙事方式讲述战争经历、移民故事或生活片段,使年轻一代逐渐形成这种“内化的历史感”。其中语言与称谓体系作为伦理秩序的隐性符号系统,在归国者家庭中依然具有延续性。虽然在日本社会中主流语言为日语,但部分家庭在私密场域中坚持使用汉语,延续了中华传统亲属制度的文化脉络,体现了“语言—文化—认同”的三重联动。

3.2 代际传承的演进路径

第一代归国者作为战争的亲历者,其记忆叙述始终围绕“离散—归国”这一二元结构而展开。在他们的口述中,“农村养父母虽念及情分却仍将子女送回日本”“归国后遭遇日本亲戚排斥与家庭隔离”以及“在工厂打工时蒙受辱骂与歧视”成为反复呈现的创伤性场景。这些记忆不仅承载着个体重负,也作为集体苦难的“图腾”,在家庭内部代代相传。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文化记忆的相关概念与此相呼应(Pierre Nora, 1989: 7-24),当“创伤记忆”在某一代人的叙述中反复出现时,它便从散落的个人经验升格为具有集体认同功能的记忆场域。第一代的创伤叙事构建起显著的身份边界,也在异文化环境中形成了情感与心理的防御机制。

随着第二代日益融入日本社会,其叙事策略在继承亲代创伤记忆的同时,又有意识地对苦难细节进行淡化与重构。大桥春美调查发现,第二代在叙述中常以理性化的方式呈现经历:他们虽会提及“满蒙开拓团战后被国家抛弃”的历史,却倾向于强调双语能力与跨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就业竞争力和家庭优势(大桥春美, 2011: 15-27)。这种选择性重构既是对上一代叙事的延续,也是对日本社会“同化”与“他者化”双重压力下的策略性回应。这一过程既隐含了对第一代“苦难图腾”保护性淡化的选择,也使得第二代能够在现代日本社会中取得更高程度的社会整合与资源回报。

进入第三、四代,归国者家庭的文化资本进一步实现质的跃升。与第一代的创伤记忆和第二代的选择性淡化不同,三、四代创伤细节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家族战后遗孤经历”“艰辛生活”的淡化表述。正如艾丽斯·沙利文(2001)所言,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化不仅依赖于原生家庭,更在社会场域的互动中不断进行再生产,三、四代归国者将双语能力、跨文化适应经验和国际视野等文化资本转化为核心竞争力,从而在社会融入与职业发展中占据相对优势。基于前文广岛地区的调查(任惠中, 2023: 65-67),多数受访者三、四代凭借中日双语能力、跨文化适应力等在升学录取与就业竞争中获得优势,能够拥有较高学历或获得跨国公司的职位机会。相较于普遍在工厂从事体力劳动的一、二代,三、四代实现了在社会结构中的上升,这种上升为其掌握更广泛的话语资源提供了基础。随着其社会位置的流动,文化资本进一步通过符号化权力被转化为记忆话语权。一些三、四代在研究机构、大众传媒等就职,他们在公共传播、学术讨论或社会倡议中重新叙述家族历史时,其叙事更易被主流语境所接纳与认可,增强了归国者记忆在公共文化语境中的能见度与影响力。最终,这种制度化的资本转化机制不仅促进了个体的社会流动,也推动了家族记忆在公共话语中的认可与传播。

3.3 代际叙事的范式特征

在考察归国者文化资本路径形成的基础上,可以观察到以第一、二代归国者为代表的群体,其叙事往往呈现出以创伤具身化为核心的“苦难展演”模式;而第三、四代在继承文化资本的过程中,则更多地采取了抽象化与去情境化的叙事策略。这种转型并非单向的强制灌输,而是各代际基于现实场域诉求而达成的叙事转型。

第一、二代归国者在叙事生产中普遍表现出“策略性回避”与“脱敏化处理”。处于创伤记忆核心的老一辈,在家庭内部传承中往往倾向于弱化甚至隐去关于战争遗留、社会排斥等苦难维度的叙事。相反,他们策略性地通过筛选记忆更多地强调家族历史中的文化多样性。这种“脱敏”不仅是为了保护后辈免受代际创伤的次生伤害,将曾经的负面的记忆重构为正面的跨文化资本,为后辈社会重构身份提供正向支撑。

第三、四代归国者受制于时代语境的变迁与认知距离的拉长,年轻一代普遍对宏大且沉重的创伤叙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疏离感,不愿沉溺于长辈的苦难叙事(南诚, 2018: 73-88)。在社会融入过程中,他们倾向于将家族背景与自身职业发展相结合,使创伤历史转型促进沟通和解与提升社会处境的优势。正是这种代际间的叙事转型,为归国者记忆进入主流话语体系提供了契机。当悲情的、排他性的创伤叙事被转化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多样性叙事时,归国者的群体记忆不再局限在家族历史的封闭边界,而是上升为民众史的一部分,更为其获取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奠定了坚实的叙事基础。

4 记忆的转化机制

在不同时代语境中,集体与个体记忆的转化机制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中国归国者的个体命运深刻受限于中日关系的波动与日本政策缺位。在二战后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战后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或孤儿在身份、法律、文化与国家记忆中均处于“不可见”状态。这种“制度性空白”导致其历史经验无法进入官方历史叙述体系,其记忆长期依附于家庭场域,呈现出私人化、碎片化、情感化的典型特征。

4.1 个体记忆的私域沉淀(1945-1975)

个体记忆普遍以碎片化形式存于日记、书信、照片等非正式载体中,缺乏系统整理与健全的档案机制。对中国战后归国者家庭中传承机制研究指出,这类“私有记忆”在家族内部长期隐匿,多数创伤记忆因为战后遗孤自身不愿过多提及,故在战后和平教育与战争记忆传承中,第三代与第四代所接收到的祖辈经验往往缺乏连续性,多通过家庭内部的“生活对话”或“片段性记述”传达。另一方面这类“私有记忆”在家庭之外传播有限。在日本社会的记忆政治格局中,这类非官方、非媒体介入的历史叙述长期处于边缘地位,难以纳入主流话语体系进而转化为公共记忆资源。

其次,尽管部分归国者家庭尝试整理口述回忆、家庭年表、族谱等文献,但整体上家族史在跨代际传承中容易出现断裂与遗忘。有些归国者的后代对祖辈经历几乎一无所知,或仅知其“曾在中国长大”。归国者家庭中系统化的家族史书写较为稀缺。多数家庭并未形成如族谱、年表等系统性文献载体,而是依赖记忆的临时再现与口述传统。这导致归国者家庭在认同构建上也面临巨大困难,常常在“归属日本”与“成长于中国”之间徘徊。但这种私人域记忆的沉淀为其后记忆的集体化与国家化奠定了复杂的心理与结构基础。

最后,家族记忆具有高度的情感依附性。与宏观叙事中国家主导的“归国者”形象不同,家庭内部的记忆更关注个体的情绪经验与生活实感,其叙述往往更为琐碎却也更具有温度。这种记忆表达方式,使得归国者的历史记忆具备“生活性历史”的特征:它往往不是线性的、事件驱动的,而是围绕亲情纽带、身份疑惑、原乡意象等多重主题展开的碎片性叙述。这些家族叙事常通过口述方式传递,历史内容常因讲述者的情绪状态而异,从而增添了记忆的不稳定性。然而,正是这种充满生活细节与真实情感的叙事,使得归国者的故事在后期通过媒体、文艺作品进入公共视野时,具备了强烈的感染力与认同唤起功能。

4.2 社群互动下的公共化转型(1975-2001)

这一时期,归国者记忆经历了从个体记忆向公共化转型的跃迁。这一转型并非自然发生的线性过程,而是由国家政策介入、媒体互动以及社群组织化与归国者的社会生活融入等共同驱动的记忆文化的生成过程。

第一,国家政策介入与媒体互动,为边缘记忆进入公共视野提供了合法性框架。1975年,日本政府首次启动“中国残留孤儿”身份寻亲调查,这一行政行为标志着记忆政治的结构性转向,从战后长期的被遮蔽的创伤走向有限的国家责任。在此背景下,大众传媒成为记忆社会化的关键推手。NHK、《读卖新闻》等主流媒体对寻亲过程、身份冲突及文化适应的集中报道,使归国者的个体遭遇脱离了家庭内部的沉淀路径,被转化为具有社会公共性的议题。随着1994年《中国残留邦人支援法》的确立以及其后不断修订的新支援法(中国残留邦人等归国促进·自立支援法,1994),进一步从立法与制度层面确立了国家的援助义务。这不仅是将归国者纳入国民福利体系的行政吸纳,更是一种历史地位的政治确认。它将归国者的命运与国家战争责任相捆绑,从而为个体记忆进入国家叙事框架开辟了制度性通道。

第二,在社群空间中构建集体记忆,促进了个体记忆向社区属性的集体记忆的凝聚。随着1984年“中国

归国孤儿定居促进中心”的设立,2001年“中国归国者支援交流中心”的体系化设立,以及各类支援中心与交流会的制度化运作,归国者获得了宝贵的记忆实践场所。在这些特定的社会空间内,原本碎片化的个体记忆通过定期的倾听会、口述展览及多元文化讲座,实现了归国者记忆的互证与共享。这种自下而上的互动机制具有双重效应:对内,它通过归国者群体间相似经历的沟通,强化了群体内部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联结,促成了该记忆共同体的凝聚;对外,它将私密的移民经验转化为可供社会消费与反思的公共话语资源,提升了边缘历史在主流社会中的能见度。

第三,归国者作为“活体记忆”的载体,其记忆的公共化不仅依赖于宏大的制度安排,更渗透于工作、教育及亲子互动等日常生活中。归国者在与日本社会的互动中,不断重述与传播自身的历史经历。这种互动超越了单纯的创伤倾诉,凭借跨文化记忆的代际传承与社会交往推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历史理解。这种基于生活实感的叙事,往往比宏大叙事更具感染力,能够引发广泛的社会共情,从而潜移默化地推动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认识的多元化发展。

4.3 叙事重塑与国际化表达(2001-2025)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归国者愈发被日本学术界与社会政策所重视。根据2025年6月的统计,在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运营的学术信息数据库有超过456篇学术论文聚焦于该群体,研究议题覆盖语言社会融合、文化认同建构、生活援助等方面。这些成果通过对口述史方法的广泛使用,不仅提升了记忆叙事的史实可信度,也加强了归国者群体在历史研究与公共叙述中的话语能动性。

日本厚生劳动省自2017年起开展的“命运的轨迹”项目,访谈20位中国遗孤及其亲属并公开发布证言影像,通过可视化、数字化方式推动历史继承与中日和平教育,并使归国者个体的生命叙述成为国家推动的“和平记忆”工程的一部分。这一系列努力不但提升了归国者历史的公共性传播,也加速了“共识性转化”——即从被动接受叙事转为主动建构国家记忆的一环。国家从政策、法律与文化层面进行引导,将个人的“边缘记忆”转化为社会共享的“认同资源”。

在实体展示层面,日本政府与地方社会也积极建设以和平记忆为主题的“中国归国者叙事场域”。日本总务省设立的“和平祈愿展示馆”“满蒙开拓团和平纪念馆”结合实物、历史档案、虚拟现实与互动体验技术(平和祈念展示资料馆,2026),在多地巡回展出有关中国归国者的生活轨迹、亲属分离、文化适应与再归属过程。该平台强化了社会历史认知,并通过跨平台交互机制拓展了公共参与路径。同时,中国国内也建立了以“中国养父母纪念馆”为核心的数字文化平台(中国养父母纪念馆,2023),系统记录中国养父母与日本遗孤之间的历史互动与文化联系,构成跨文化叙事空间。此外,日本各地归国者支援交流中心发起的“倾听历史”活动(战后世代讲述者宣讲会通知,2026),鼓励个人提供私人照片、家书、证件等记忆材料,由机构进行数字化与主题整理,从而形成具备史料价值的“归国者记忆文库”。这一过程突破了国家规训的主叙事边界,强调民间主体在历史叙述中的能动性与代表性,进一步促进了“记忆的社会再生产”。

归国者记忆的公共化进程并不仅仅依赖国家体制,大量艺术作品的参与与再创作也推动了记忆符号的形塑。尤为典型的是小说与影视作品对归国者记忆的“符号化加工”。山崎丰子创作的小说《大地之子》,以及其后NHK拍摄的同名电视剧,借助文艺叙述手法再现了中国残留孤儿的命运苦难,将战后遗孤群体的个体记忆纳入国家宏大叙事之中,引发社会广泛的共鸣,推动个体创伤叙事向社会集体认知的转译。近年来,NHK放映的《遥远的羁绊》《不再被遗忘》等影视作品,聚焦于中国归国者身份认同等问题,触发中日两国观众的广泛情感共鸣,推动归国者进入更广阔的国际传播与公共讨论空间,强化了该群体记忆的国际化表达与社会化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归国者记忆的公共化转型,实质上是在国家制度供给、社群交互实践与媒介符号表征的

共同驱动下,个体生命历程向共同体文化记忆转化的过程。其一,国家通过身份确认与制度性支援,为归国者记忆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了合法性框架;其二,社群组织与日常互动空间的持续运作,使这些记忆得以在反复讲述与互证中获得稳定性与集体属性;其三,大众传媒、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等象征实践,承担了记忆转译与传播的关键功能,将封闭于家庭与个体层面的战争经验、身份困惑与跨文化体验,转译为可被社会广泛理解、反思与共情的公共议题,推动记忆的社会化、国际化传播。

5 结 语

中国归国者的生命史书写,本质上是对日本战后“受害叙事”与“责任缺失”双重症结的有力回应。长期以来,日本官方叙事通过放大原子弹爆炸等个体受害记忆,策略性地遮蔽侵略扩张的结构性责任。归国者群体以生命史为媒介的经验叙述,打破了这种“制度性遗忘”。他们作为“具身化”的历史载体,将碎片化、私域化的创伤记忆转化为具有公共力度的历史见证,不仅弥合了官方宏大叙事与民间微观记忆之间的断层,更迫使主流社会在生活互动中感知、重塑历史,直面战争暴力对微观个体的深远剥蚀。

由此,可清晰梳理出中国归国者“记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首先,以家庭情感联结为伦理原点实现代际传承,确保了记忆在私人场域的存续;其次,以社群互动网络为中介凝聚群体认同,通过经验的互证与互诉,实现了记忆的集体化生产;最后,通过跨文化交流将个体生命经验推向公共领域,借助媒介传播与政策确认,使历史记忆在社会语境中获得嵌入与升华。在这一逻辑链条中,政策变迁、社会结构与日常伦理共同形塑了记忆的可见性,而归国者作为叙事主体,其能动性的发挥不仅重述了历史,更重构了跨国语境下的文化共同体。

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归国者记忆共同体实践最终指向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东亚记忆共识。归国者群体因其多重身份属性,天然具备了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情感共鸣能力与“文化桥梁”的潜质。这种记忆实践不仅是对日本历史记忆症结的反思性回应,更表征具有东亚主体性的记忆文化范式,即以文明互鉴取代文化隔阂,以共同反思抵消片面的受害叙事,通过跨文化协商构建区域性的记忆共同体。这种从“封闭民族记忆”向“开放区域共识”的转向,突破了传统民族国家史观的局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东亚记忆建构提供了理论参照与实践借鉴。

参考文献

- 王向远. 中国的东亚认同与东亚话语建构[J]. 江海学刊, 2023(1).
- 中国养父母纪念馆[EB/OL]. [2025-06-28]. <http://www.cjbeyond.com>.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关亚新, 张志坤. 日本遗孤调查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杜颖. 黑龙江省与日本民间交流四十年回顾——以日本遗孤友好交流为中心[J]. 日本研究, 2012(3).
- 张龙龙. 日本遗孤回国后的社会融合过程[J]. 日本研究, 2021(1).
- 赵彦民. 战后日本“满洲移民”的记忆与继承——以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为中心[J].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49(5).
-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丁文磊, 松原茂樹, 下田元毅, 等. 高齢中国帰国者の環境移行と住環境の実態に関する研究——中国残留邦人一世・二世とその配偶者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を通して[J]. 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 2022, 87(793).
- 大橋春美. 文化間移動とキャリア形成——中国帰国者二世という経験から[J]. 異文化間教育, 2011(33).
- 小都晶子. 日本人移民政策と「満洲国」政府の制度的対応——拓政司、開拓総局の設置を中心に[J]. アジア経済, 2006, 47(4).
- 山田朗. 戦争の記憶をどう引き継ぐか——〈表の記憶〉と〈裏の記憶〉[J]. 生活協同組合研究, 2020(535).
- 日本厚生労働省援護局. 中国残留孤児白書[M]. 東京: 厚生省援護局, 1987.
- 中国残留邦人等帰国促進・立支援法(平成6年法律第30号)[S]. 日本法令索引. <https://hourei.ndl.go.jp/simple/detail?lawId=0000080019¤t=-1>.
- 平和祈念展示資料館[EB/OL]. [2025-06-28]. <https://www.heiwakinen.go.jp/goriyou/school/support/>.
- 任惠中. 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児帰国者家族の研究: 広島県在住者の事例を通じて[J]. 広島大学大学院人間社会科学研究科紀要: 総合科学研究

究,2023(4).

穴戸伴久.戦後処理の残された課題——日本と欧米における一般市民の戦争被害の補償[J].レファレンス,2008,58(12).

浅田喬二.満州農業移民政策の立案過程[J].満州移民史研究会編.日本帝国主義下の満州移民.東京:龍溪書舎,1976.

浅野慎一.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児から学んだこと(第16回)——残留孤児の国家賠償訴訟[Z/OL].2021.<http://www.dignity-reconciliation.jp/pdf/d51.pdf>.

河本尚枝.高齢中国帰国者の生活支援ニーズ[J].広島大学人間社会科学研究科紀要,2021,2.

南誠.「中国帰国者」をめぐる包摂と排除——国籍と戸籍に注目して[C]//庄司博史,編.移民とともに変わる地域と国家.吹田:国立民族学博物館,2009.

南誠.「中国帰国者」問題の研究可能性——生成的な境界文化の探求をめざして[J].グローバル研究,2018(5).

南誠.中国帰国者をめぐる包摂と排除の歴史社会学:境界文化の生成とそのポリティクス[M].東京:明石書店,2016.

厚生労働省.未帰還者に関する特別措置法:(法律第七号)昭和三十四年三月三日[S/OL].1959[2025-03-13].https://www.mhlw.go.jp/web/t_doc?dataId=83033000&dataType=0&pageNo=1.

桜本富雄.満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M].東京:青木書店,1987.

高橋朋子.あの戦争から遠くはなれて[C]//蘭信三,編.中国残留日本人という経験.東京:勉誠出版,2009.

張龍龍.帰国援護政策と中国残留孤児の永住帰国過程——帰国動機に注目して[J].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2017(62).

細谷亨.満蒙開拓団と食糧問題・異民族支配[J].歴史と経済,2018,60(3).

戦後世代の語り部講話会のお知らせ[EB/OL].[2025-06-28].<https://www.sien-center.or.jp/kataribe/index4.html>.

蘭信三,編.中国帰国者の生活世界[M].東京:行路社,2000.

Alice Sullivan.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J].Sociology,2001,35(4).

Ann-Marie Foster.Family Mourning after War and Disaster in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4.

Bart Ziino.“A Lasting Gift to His Descendants”: Family Memory and the Great War in Australia[J].History & Memory,2010(22).

Jan Assmann.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M].Dordrecht:Springer,2011.

Lori Watt.When Empire Comes Home: Repatriation and Reintegration in Postwar Japan[M].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

Lucy Noakes, Wallis, James. The People's Centenary? Public History,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in Britain's First World War Centenary[J].The Public Historian,2022,44(2).

Pierre Nora.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Les Lieux de Mémoire[J].Representations,1989(26).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Evolution of the Memory Community of Japanese Returnees from China

REN Huizhong

(Shanxi University)

Abstract: Cultural Memory theory has provided a vital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postwar memory practices in Europe. However, in the Asian context, Japan's postwar historical cognition and memory construction have long exhibited structural tensions. The complexity of Sino-Japanese postwar memory pos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the theoretical adaptability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regarding its localized application in Asia. The deepening and expansion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ffers a new axiological orientation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examining and interpreting Sino-Japanese cultural memory within the Asian context. Based on this concep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urther expand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the "Memory Community." Using the memory practices of the Japanese returnees from China (known as Chugoku Kikokusha) as an empirical case, and relying on the Cultural Memory framework,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memory during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from three dimensions: memory dissemination field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and memory transformation paths. Ultimately, based on social group memor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constructing a Sino-Japanese "Memory Community." It seek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an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both nations to transcend war trauma, build a regional cultural memory community, and achieve historical consensus and cultural dialogue.

Keywords: Memory Community; Cultural Memory; Japanese Returnees from China;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Post-war Memory

(责任编辑:李广悦)